

# 对晋西会议情况通报收报人“朱郭”的考证

牛冠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东城 100009)

**【摘要】**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晋西举行。会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没能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林聂徐程并报朱郭”,通报会议召开情况,传达会议精神。因当时收报人用的只是姓氏简称,而不是姓名全称,致使后人在对收报人“朱郭”二人的判断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均认为“朱郭”分别指朱瑞与郭述申,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4)》与《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则把“朱郭”断为朱理治与郭洪涛。通过梳理晋西会议前后毛泽东所发电报收电人姓名排序规律,并分析会议内容,“朱郭”很有可能指的是朱理治与郭洪涛,而不是朱瑞与郭述申。

**【关键词】**晋西会议;朱郭;朱瑞;朱理治;郭述申;郭洪涛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23)05-0101-06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3.05.007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晋西举行(以下简称晋西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统一战线工作三个方面的问题,确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与“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原则。会后,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政治委员毛泽东,致电没能出席会议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及其他相关人员,通报会议召开情况,传达会议精神。

## 一、几种文献对晋西会议情况通报收报人“朱郭”的记载存在分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上)(以下简称《年谱》)1936年3月28日记有此事:“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报朱瑞、郭述申,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sup>[1] 527</sup>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所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4)》(以下简称《文献》)收录有《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情况的通报》即《年谱》所记之电,但《文献》所记收电人姓名并非全称,而是简称,“林、聂、徐、程并报朱、郭”<sup>[2] 257</sup>,下面给出的注释是:“指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报朱理治、郭洪涛。”<sup>[2] 257</sup>显然,《文献》对朱、郭二人的确认与《年谱》截然不同,那么,朱、郭到底是朱瑞与郭述申,还是朱理治与郭洪涛呢?

**【收稿日期】**2023-04-13

**【作者简介】**牛冠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该电最早见诸的公开文献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6年编选的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以下简称《资料》),《资料》收录时编加的题目是《关于中央政治局讨论与决定政治军事等问题的简要内容》,《资料》并未标明收电人,只是在题解中指出:“这是给‘林聂徐程并报朱郭’的电报。”<sup>[3] 505</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以下简称《选编》)也载有该电,题目是《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通报》,《选编》所记收电人姓名也非全称,而是简称,“林聂,徐程并报朱郭”<sup>[4] 63</sup>,后面给出的注释是:“指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朱瑞、郭述申。”<sup>[4] 64</sup>需要指出的是,《选编》是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以下简称《军事文集》)收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报》即彭德怀、毛泽东致“林聂徐程并报朱郭”等人的电报,《军事文集》在该电的后面特意标明其来源,“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sup>[5] 501</sup>。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收电人姓名用的也是简称,甚至未加标点符号,并没有明确指出“朱郭”究竟是指何人。但《军事文集》的编者给出了他们自己的注释:“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的电报。”<sup>[5] 501</sup>此处不但指出朱、郭是何人,还同时标明了朱、郭二人的职务。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所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以下简称《丛书》)一书也收录有该电,题目是《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情况的通报》,《丛书》编者如下注解收电人:“林、聂、徐、程、朱、郭,指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朱理治、郭洪涛(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

记)。”<sup>[6] 297</sup>此处只标明了郭的职务,而未标明朱及其他人的职务。

## 二、分析晋西会议前后毛泽东所发电报收电人姓名排序规律,基本确定“朱郭”不是朱瑞与郭述申

晋西会议前后,毛泽东所发电报收电人姓名排序,根据他们当时担任的职务,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可以通过分析收电人的职务,来排除甚至确定收电人究竟所指何人。

电报的收电人为“林聂徐程并报朱郭”<sup>①</sup>,前面的“林聂徐程”已经确定,指的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对于“朱郭”,《年谱》和《选编》认为是朱瑞和郭述申,二人当时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年谱》记载:1935年11月30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周士第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sup>[1] 491</sup>朱瑞与郭述申同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与所在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同为军团主要领导人,一起收电,似乎理所当然。

但分析同时期毛泽东发给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的电报,其收电人的姓名排序一般是:一、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二、红一军团军政主要领导;三、红十五军团军政主要领导;四、其他人。

如《年谱》记载:1935年12月27日,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sup>②</sup>,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sup>[1] 499-500</sup>此处收电人的姓名排序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朱瑞与林彪、聂荣

臻同为第一军团主要领导，在收电人姓名排序上紧接林、聂二人之后，同样，郭述申与徐海东、程子华同为第十五军团主要领导，在收电人姓名排序上，也紧接徐、程二人之后。

此外，《年谱》所记1936年2月10日“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sup>③</sup>、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sup>[1] 509</sup>；所记1936年2月12日“为发布东征命令，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告周恩来”<sup>[1] 509</sup>；所记1936年2月28日“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sup>[1] 515</sup>；所记1936年3月2日“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问题，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致张云逸，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sup>[1] 517</sup>；所记1936年3月17日“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通报驻大麦郊一带部队没收富农中农财产、破坏学校用具、乱向商人捐款等严重现象，要他们立即纠正并严格检查纪律”<sup>[1] 522</sup>，也都遵循上述规律。

从以上几封电报可以看出，晋西会议之前，在毛泽东发给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的电报中，同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与郭述申，其收电姓名排序遵循的规律是：分别排在各自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之后，一般两人不会单独并排在一起。

晋西会议之后，毛泽东发给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的电报，收电人姓名排序一般仍遵循上述规律。如《年谱》所记1936年5月26日，“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陕甘宁省委、省苏于本月底可到保安。”<sup>[1] 545</sup>左权当时接替林彪任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并未变动，仍然分别为聂荣臻和朱瑞，故在收电时，左权、聂荣臻、朱瑞三人先后排在一起，王首道当时接替郭述申任第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与政治委员也未变动，仍然分别为徐海东和程子华，故在收电时，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三人先后排在一起，且排在

第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朱瑞之后。

此外，在以上几封电报中，1936年2月12日的收电人出现“并告周恩来”，1936年3月2日的收电人出现“并致张云逸……”。“并告”后面的周恩来虽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彭德怀实为中央军委主要领导，负责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但当时他未与毛泽东、彭德怀在一起，故毛泽东与彭德怀发给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主要领导的电报，有必要告知他。“并致”后面的张云逸虽时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但不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军政领导成员，其军内地位不如下辖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高，故在收电时姓名排于两个军团主要领导之后。

当时红一方面军除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外，还下辖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军。刘志丹与宋任穷当时分别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故两人排在一起，阎红彦和蔡树藩当时分别担任红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故两人排在一起，萧劲光当时担任红二十九军军长，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由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兼任，他主要负责地方工作，故毛泽东和彭德怀、杨尚昆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问题致红一方面军下辖各军团及各军主要军政负责人的电报，收电人姓名中并无朱理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毛泽东同时期发给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的电报，若收电人中出现“并告”或“并致”，“并告”或“并致”后面的收电人一般都与前面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无关，而是另有所指。此外，“并告”或“并致”一般指的是一并把电报也发给某人，而不是由前面的收电人代为转告。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认：1936年3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聂徐程并告朱郭”电中“并告”后面的收电人“朱郭”，似不应当为朱瑞与郭述申，如果是他们二人的话，他们二人当时都与军团主要军政领导一起随军行动<sup>④</sup>，他们就如以往一样，直接与“林聂徐程”一起收电了，似没有必要再单独收电。



### 三、根据晋西会议情况通报发报内容，推测“朱郭”指的是朱理治与郭洪涛

晋西会议情况通报收电人中“朱郭”并称，说明二人当时职务相当，排除“朱郭”是朱瑞与郭述申后，在当时，能“朱郭”并称的，还有朱理治与郭洪涛。

朱理治当时担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两者职务对等。1935年9月17日，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了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省委，“见面时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中央考虑撤销中央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重新组建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边省委书记。’”<sup>[7] 95</sup>因郭洪涛长期在陕北地区工作，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他的要求下，后来新的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省委成立后，郭洪涛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我回到瓦窑堡后，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委，书记由我担任”<sup>[7] 96</sup>，朱理治则担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回忆录》也有记载：“中央一到陕北，即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西省委，并要我担任陕甘省委书记。”<sup>[8] 565</sup>后来朱理治又兼任了由陕北地方武装和中宜、宜川独立营为基础组建的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

作为陕甘苏区当时仅有的两个省，陕甘省当时的管辖范围是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中宜六县和陇东的华池、庆北、新宁、合水、新正、曲子、环县、静宁、赤庆、定环十县，它既是陕甘苏区的屏障，又是抗击西安之敌的前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陕甘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并没有随队东征。红军东征期间，他留在后方负责巩固和扩大苏区，防止西安之敌进攻苏区。“那时，省委除了要建立健全各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队伍外，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保卫陕甘苏区。因为，国民党军的‘围剿’虽然已被粉碎，但包围苏区的东北军仍6万之众；

加之红军主力于1936年2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陕甘苏区只剩下少量正规红军，使敌我力量相差更为悬殊。”<sup>[9]</sup>

当时陕西省的管辖范围是子长、秀延、靖边、横山、米东、安塞、延安、延川、延长、延水、清涧、绥德、吴堡等县，主要在黄河以西，红军东征就是从清涧、绥德等县的渡口过的黄河。陕西省作为红军东征的直接大后方，关系到东征红军的后勤保障，作为陕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郭洪涛也没有随队东征，而是留在后方主持苏区工作，巩固并扩大苏区，为红军东征提供坚强的后盾，保证必要时东征部队能够顺利安全撤回到苏区。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郭洪涛和陕西省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张闻天在总结发言时着重阐述了陕甘根据地的地位和任务，指出：“陕北苏区<sup>⑤</sup>目前是处在抗日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sup>[7] 97</sup>

除巩固和扩大苏区外，扩大红军也是当时红军和苏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11月18日，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sup>[1] 487</sup>。1936年3月20至27日召开的晋西会议，再次强调要扩大红军并就扩大红军提出了明确任务：“2.决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3.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前方担任三万，争取超过。4.四个月内完成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七团的编制，每团七百五十人。5.地方红军，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军，每军一千五百人。”<sup>[4] 63</sup>从中可知，中央要求近半年之内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其中在前方参加东征的部队主要是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负责三万人，地方红军负责六千人，地方红军主要是指留守后方由陕西省委和陕甘省委领导的红军部队。

晋西会议要求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与前方

的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后方的陕甘省委、陕北省委都有直接关系，因此，从所要传达的会议内容来说，作为参加会议又是主要军事负责人的毛泽东与彭德怀，会后既要把会议内容和精神传达给在前方作战未能参会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主要军政负责人，又要传达给留守后方不能与会的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使他们清楚了所要担负扩大红军的数量，从而能够如期完成中央交办的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

朱理治与郭洪涛作为当时陕甘苏区仅有的两个省的主要负责人，虽无现实条件东渡黄河去参加在晋西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后由主要参会者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也是合乎实际的。从这一点来说，1936年3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聂徐程并告朱郭”电中的“朱郭”，似应当指的是朱理治与郭洪涛，而不是朱瑞与郭述申。

当然，以上判断也只是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而做的一种间接推测，目前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年谱》《文献》《选编》《军事文集》和《丛书》等明确断定“朱郭”二人为何人外，而当事人朱理治、郭洪涛、朱瑞、郭述申等人的传记、回忆录等相关文献，均未直接注明他们四人究竟谁收到了毛泽东与彭德怀所发的关于晋西会议情况通报的电报，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朱郭”为朱瑞与郭述申的可能性。

## 结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规范电报滥用人名省略，要求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

《年谱》与《文献》等文献对晋西会议情况通报收报人“朱郭”二人名字判断出现分歧，是由当时电报中人名多用省略引起的。革命战争年代，受制于当时的电报技术和成本，电文内容往往惜字如金，越少越好，再加上安全考虑，为了节省电文从而节省收发报时间，故中共党政军往来电报收电人与发电人姓名，用省略的情况大量存在。在当时，因为电台有限，有电台才能发报，有电台也才能收

报，发电人与收电人都是特定的，彼此知道对方，电报中人名用省略，很多情况下，并不会引起时人的误解，但对后人阅读，却带来诸多不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党中央工作任务繁多，中央与各地的往来电文也随之增多，毛泽东也开始意识到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电报中人名用省略所带来的缺点。1950年11月22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sup>[10] 682</sup>。

胡乔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按他的要求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初稿，初稿经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等人修改充实后，又交毛泽东审阅。1951年1月27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并于1月28日改定。

1951年2月1日，经毛泽东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印发全党，其中明确指出电报滥用人名简称带来的弊端，“现在许多电报文件中，对人名、地名、年月日、机关名、事物名滥用省略，使阅者很费记忆和猜想的工夫，有时简直莫名其妙”<sup>[11] 87</sup>，并针对电报中人名滥用省略，明确要求规范：“除对大家习知的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负责同志，野战军（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有时（不是一切时间，也不是多数时间）在电报上下款可以写姓不写名，或姓下加职衔，例如‘毛主席’、‘周总理’、‘陈饶’、‘彭习’等以外，一般情况，无论在电文中，或在上下款，须一律写姓名，不得只写姓不写名。必要时，还须在姓名之前加上职衔，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sup>[10] 88</sup>

应当说,这种规范是十分必要的,也有条件去贯彻执行,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收发报的安全不再成为突出的问题,对于发报人而言,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译发电文,对于收报人而言,他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去接收电文,清楚了便成为往来电文的首选,故而需要对电报中人名、地名等滥用省略加以必要的规范。

注释:

- ①一作“林聂徐程并报朱郭”,原电六个收电人姓之间,并无标点符号,不同版本的标点符号,为后人所加,所加标点符号虽不相同,但大体上可以把六人分为三组,林、聂一组,徐、程一组,朱、郭一组,根据对红一方面军同时期所发电报的分析,每组的两人,具有某些方面的联系,一般职务相当。
- ②当时电报收电人姓名皆用姓氏简称,且姓氏之间无标点符号,姓名全称及标点符号为《年谱》编者所加,下同。
- ③叶剑英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故排名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之前。
- ④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物传》第15卷的记载:1936年2月,朱瑞随同一军团东征。《郭述申年谱及著述补遗》也记载:(1936年)2月21日,随东征右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从无定河口渡过黄河,投入战斗。
- ⑤此处的“陕北苏区”,指陕甘革命根据地。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4[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G].内部资料,1986.
-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毛泽东军事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 [7]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8]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9]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N].人民日报,1991-08-18.
-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刘 滢】

## Who Are “ZHU and GUO”: An Examination on the Recipients of the Report on the Jinxi Conference NIU Guanhe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ng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From March 20th to 27th of 1936,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eld a meeting in western Shanxi. After the meeting, Mao Zedong and Peng Dehuai telegraphed the absentees, “Lin, Nie, Xu, Cheng, Zhu and Guo”, to brief them on the meeting. As the recipients of the copy noted with their surnames instead of their full names, there have been disagreements over who the two recipients, “Zhu and Guo” are. One version is that “Zhu and Guo” refer to Zhu Rui and Guo Shushen, according to *The Chronicles of Mao Zedong (1893–1949)* (Vol. 1, Revised Edition), *The Collected Military Works by Mao Zedong* (Vol. 1), and *A Se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1949)* (Vol. 13).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Se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Long March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The Documents* (4), and *The Military Struggles to Consolidate and Promote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Vol. 1), “Zhu and Guo” refer to Zhu Lizhi and Guo Hongtao. By examining the regularity for the order of the recipients of Mao Zedong’s telegraphs during the time around the Jinxi Conferenc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meeting,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Zhu and Guo” refer most likely to Zhu Lizhi and Guo Hongtao, rather than Zhu Rui and Guo Shushen.

**Key Words:** Jinxi Conference; Zhu and Guo; Zhu Rui; Zhu Lizhi; Guo Shushen; Guo Hongtao